



# 袁黄与科举考试用书的编纂

## ——兼谈明代科举考试的两个问题

张献忠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 天津市 300071;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市 300017)

**摘要:**明代中后期, 科举考试和商业出版都特别发达。适应市场的需求, 书坊刊刻了大量科举考试用书, 很多著名文人成为科举考试用书的作者, 袁黄就是其中重要的一位, 他编纂了至少十余部科举考试用书, 这些书深受市场欢迎, 在士人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拟就袁黄编纂的、且在当时已经出版过的科举考试用书进行考证和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明代科举考试的指导思想和二三场在整个科举考试中的地位。

**关键词:**袁黄; 举业用书; 科举考试指导思想; 二三场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0)03-0193-07

### 一、明代科举考试用书出版情况简述

广义上的科举考试用书包括各类经史图书, 但明代尤其是中后期, 由于科举考试日趋规范化和程式化, 大部分读书人考试的目的性更加明确, 于是不再潜心钻研经书大义, 而是转向揣摩时文和答题技巧。本文所说的科举考试用书是狭义的, 主要是指科举考试范文和作文技法之类的参考书; 另外, 明代中叶以后, 为了满足士人应试的需要, 出现了一大批以考试为导向的阐释四书五经和历史的著作, 这类图书虽然也有一定的研究性, 但其主旨却是为应考者答疑解惑, 因此也属于狭义的科举考试用书的范畴。

早在成化、弘治年间, 科举考试用书就开始大量刊刻和流通, 其中以《京华日抄》的刊行为标志。明代杭州著名的藏书家郎瑛在其笔记《七修类稿》中说: “成化以前, 世无刻本时文, 吾杭通判沈澄刊《京华日抄》一册, 甚获重利; 后闽省效之, 渐至各省刊提学考卷也。”<sup>[1]</sup>卷二十四《山西通志》也记载说成化年间“举业者多记《京华日抄》”<sup>[2]</sup>卷134。由此可见, 《京华日抄》刊刻后, 深受士子们欢迎, 同类的书也随之大量刊刻, 以致引起了一些士大夫的恐慌。成化年间山西闻喜县举人赵仲辉就“奏请禁绝”《京华日抄》<sup>[2]</sup>卷134, 弘治四年(1491)正月, 时任南京国子监祭酒的谢铎就在给明孝宗的奏疏中说: “今之所谓科举者, 虽可以得豪杰非常

之士, 而虚浮躁竞之习亦莫此为甚。今而不读《京华日抄》, 则读《主意》, 不读《源流至论》, 则读《提纲》, 甚者不知经史为何书……臣愚乞敕提学等官, 凡此《日抄》等书, 其板在书坊者, 必聚而焚之, 以永绝其根柢。其书在民间者, 必禁而绝之, 以悉投于水火。”<sup>[3]</sup>卷26, 《奏修明教化事》 谢铎焚烧和禁绝《京华日抄》等书的建议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弘治十一年正月, 河南按察司副使车玺再次上奏要求焚毁《京华日抄》之类的图书, 他上奏说: “祭酒谢铎奏革去《京华日抄》等书, 诚有补于读书穷理, 然令行未久而夙弊滋甚。《日抄》之书未去, 又益之以《定规》、《模范》、《拔萃》、《文髓》、《文机》、《文衡》、主意之书, 未革去又益之以《青钱》、《锦囊》、《存录》、《活套》、《选玉》、《贯义》, 纷纷杂出, 由禁之未尽得其要也。乞敕福建提督学校官, 亲诣书坊, 搜得书版尽烧之, 作数缴部, 仍行两京国子监及天下提学, 分巡分守等官严加禁约, 遇有贩卖此书并歇家各治以罪。若官不行禁约, 坐以不奉诏令之罪。”<sup>[4]</sup>卷4 弘治十二年, 孔庙和建阳书坊先后发生火灾, 吏科给事中许天锡认为这是上天的警戒, 上奏要求焚毁时文类的图书: “夫职正教不修, 上之所尚者浮华靡艳之体, 下之所习者枝叶芜蔓之词, 俗士陋儒妄相裒集, 巧立名目, 殆且百家梓者以易售而图利, 读者觊侥幸而决科……其余晚宋文字及《京华日抄》、《论范》、《论草》、《策略》、《策海》、《文衡》、《文髓》、《主

\* 收稿日期: 2010-03-12

作者简介: 张献忠(1973-), 男, 山东平邑人,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博士研究生; 天津人民出版社, 副编审, 主要研究明代思想文化史。

意》、《讲章》之类，凡得于煨烬之余者悉皆断绝根本，不许似前混杂刊行。”<sup>[5]</sup>卷157 正德年间（1506—1521），时文类的图书仍在不断刊行，正德十年（1515）十二月南京礼科给事中徐文溥上疏说：“近时时文流布四方，书肆资之以贾利，士子假此以侥幸，宜加痛革。凡场屋文字句语雷同，即系窃盗，不许誊录；其书坊刊刻一应时文，悉宜烧毁，不得鬻贩……”<sup>[6]</sup>卷132

从以上几个奏疏可以看出，《京华日钞》出版后，各种名目的同类书纷纷出版，至少有20种。其中《源流至论》、《提纲》、《主意》、《论范》、《论草》、《策略》、《策海》、《文衡》、《文髓》、《讲章》等大都是南宋科举考试用书<sup>①</sup>，由于天顺至弘治年间“晚宋文字盛行于时，如《论范》、《论学绳尺》之类，士子翕然宗之”<sup>[7]</sup>卷14，因此这些图书在成化和弘治年间得以重版。

虽然在成化、弘治和正德年间科举考试用书就大行其道，但种类毕竟有限，而且大部分读书人仍然皓首穷经，潜心于《四书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以及历代正史。但是到嘉靖、隆庆年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整个科举考试类图书处于一种供销两旺的态势。嘉靖年间的李濂曾说：“比岁以来，书坊非举业不刊，市肆非举业不售，士子非举业不览。”<sup>[8]</sup>卷105，《纸说》，p1033下 到万历年间科举考试用书的刊行已经达到高潮并持续至明末，这时的士子们“皆以书坊所刊时文竞相传诵，师弟朋友自为捷径，经传注疏不复假日”<sup>[9]</sup>卷22，《明郡学生陈惟功墓志铭》。

科举考试用书品种的增多也使市场竞争加剧，为增强竞争力，书坊主纷纷延请一些著名文人和科举考试的佼佼者编纂此类图书，因此很多著名的文人甚至是当朝士大夫也加入了科举考试用书的编纂活动，袁黄就是其中之一。

## 二、袁黄生平简介

袁黄（1533—1606），初名表，后改名黄，字坤仪，初号学海，后改了凡，晚年又自号赵田逸农，浙江嘉善县人。

袁黄有很深的家学渊源，其高祖袁顺因“靖难之役”中“与黄子澄谋匡复，事露出逃”，后定居吴江，“以训蒙为业”，袁顺的后代一直到袁黄的父亲袁仁大都“隐于医”。<sup>[10]</sup>839—843 袁仁与王阳明及其弟子王艮、王畿等都有往来，著有《周易心法》、《毛诗或问》、《赈蔡编》等经学著作。

袁黄13岁时，父亲去世，“老母命弃举业学医”<sup>[11]</sup>卷1，《立命之学》，p21上。但是后来袁黄遇到了一个云南孔姓异人，对他说：“子仕路中人也，明年即入学。”袁

黄“遂起读书之念”，并得到了母亲的支持。孔姓异人还预测袁黄“县考童生，当十四名；府考七十一名，提学考第九名”，结果皆应验，由此更加坚定了袁黄从事举业的信心。后来，袁黄又遇云谷禅师于栖霞山中，得其点拨，践行功过格，从此笃信佛教，发愿行善。

但是，袁黄的举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袁黄得云谷禅师点拨是在隆庆三年（1569），根据云谷禅师“汝二十年来被他（指孔姓异人——引者注）算定，不曾转动一毫”<sup>[11]</sup>卷1，《立命之学》p21下 和孔姓异人“明年即入学”之语推算，袁黄入学——考中秀才是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是年袁黄十七岁，此后袁黄先后五次参加乡试，都以失败告终，“直至丁卯年（1567年——笔者注），殷秋溟宗师见余场中备卷，叹曰：‘五策即五篇奏议也，岂可使博洽淹贯之儒，老于窗下户？’遂令县申文准贡”<sup>[11]</sup>卷1，《立命之学》p21上一下。就是说袁黄在34岁才考中贡生。隆庆四年（1570年），袁黄在南京再次参加乡试，中举。次年，袁黄参加会试，“取本房首卷”，但因“五策不合式下第”。<sup>[12]</sup>卷4，p215下 后又五次参加会试，直至万历十四年（1586）考中进士，此时他已经53岁了，早已过了知天命之年。对于艰难曲折的举业之路，袁黄是有着切肤之痛的，他在《寄夏官明书》中说：“弟凡六应秋试，始获与丈齐升，又六上春官，仅叨末第，秦裘履敝，齐瑟知非，落魄春风，孤舟夜雨，此时此味，此恨此心，惟亲尝者脉脉识之，未易为傍（旁）人道也。”<sup>[13]</sup>卷9 由此可知袁黄共参加了六次乡试、六次会试。万历十六年，袁黄任宝坻知县，在任期间，他革除杂役，减免旧赋，疏浚河道，深得百姓爱戴。万历二十年（1592），擢兵部职方司主事，适倭寇侵略朝鲜，明朝大举增援，得蓟辽经略宋应昌疏荐，袁黄到军营赞划。提督李如松“所部辽兵割高丽人首献功”，袁黄“驰谕禁之，且面数如松以袭封杀降之罪”，“如松大恨”，遂与赞画郎中刘黄裳弹劾诬陷袁黄，结果袁黄被削职归家<sup>[14]</sup>卷28，《名臣·袁黄》。

归家后，袁黄杜门教子授徒，潜心著述，“四方从游者甚众”。万历三十四年（1606），袁黄去世。天启元年（1621），吏部尚书赵南星追叙袁黄东征功勋，赠尚宝司少卿。

袁黄涉猎非常广泛，其门徒杨士范在《刻了凡杂著序》中说：“先生识高今古，学贯天人，上自天文、地理、历律、兵刑之属，下至奇门六壬、遁甲翻禽、阴阳选择之类，靡不涉其津而咀其真……”<sup>[15]</sup>《刻了凡杂著序》 袁著述颇丰，他自言“紬绎古今，删述经史，所著毋虑千卷，

<sup>①</sup> 南宋科举考试用书的出版也非常发达，戴侗在《六书故》中说：“比年以来，非程文类书，则士不读，而市不鬻。汗牛充栋，塞乎区宇。”（引自《六书故》卷二十一）

而刻行者 30 余种”<sup>[13]</sup>卷10,《答蔡虚台书》,这可能还不包括他晚年编纂的《游艺塾文规》、《游艺塾续文规》以及死后其子整理的著作。袁黄著作中有很一部分是科举考试用书,这些举业用书不仅反映了袁黄的举业思想,而且反映了明中后期科举考试以及整个思想领域的现状。

目前,学术界对袁黄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其功过格和善书以及宗教思想上;一是考证包括袁黄籍贯、生卒年等在内的生平事迹,对于其科举考试用书及举业思想却乏善可陈。下面笔者对袁黄编纂的科举考试用书做钩沉,并藉此探讨袁黄的举业思想<sup>①</sup>,探讨明中后期科举考试的指导思想以及二三场在整个科举考试中的地位。

### 三、袁黄编纂的科举考试用书考述

如前所述,袁黄在得到孔姓异人的启示之后,开始走上了举业之路。从此,除了中间六年短暂的仕宦生涯外,袁黄的整个一生都和举业联系在一起。53岁以前,他刻苦学习举业,认真研读当时和前朝举业名家的范文,还曾师从唐顺之、薛应旂、瞿景淳等八股文名家学习作文。他践行功过格,广做善事,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科举,这一点,他的“立命之学”可证:袁黄在听了云谷禅师的一席话后,“拜而受教,因将往日之罪佛前尽情发露。为疏一通,先求登科”<sup>[11]</sup>卷1,《立命之学》p22上。削职归家后,袁黄一直教授子侄和门徒举业之学,编纂了大量的举业用书。

据不完全统计,袁黄编纂并出版的举业用书有:《荆川疑难题意》、《四书删正》、《书经删正》、《谈文录》、《举业彙萃》、《心鹤》、《四书疏意》、《二三场群书备考》、《游艺塾文规》、《游艺塾续文规》、《新刻八代文宗评注》(《评注八代文宗》)、《古今经世文衡》、《史汉定本》、《新镌了凡家传利用举业史记方润五卷》等十余种。下面笔者依次对这些书的编纂情况作以考述。

#### (一)《荆川疑难题意》

《荆川疑难题意》是袁黄参与编纂的第一部举业用书,编纂和出版时间是嘉靖二十九年。这一年,袁黄跟随唐顺之学习举业,时间长近两个月,该书就是在这期间举业笔记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袁黄在《游艺塾续文规》中说:

予十八岁见荆川唐先生于嘉兴天宁寺之禅堂,即礼之为师,相随至杭,往返几两月……我朝夕执书问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大约皆完,除平常易晓者不录,录其深奥者,曰《荆川疑难题意》,先生又躬阅而手订之,

始付剞劂。<sup>[11]</sup>卷1,《立命之学》p5上

由此可见,《荆川疑难题意》是唐顺之从科举考试的角度对四书所做的阐释,袁黄根据笔记做了初步编纂整理,唐顺之审定后付梓。该书不仅没有流传下来,而且未见他书记载,因此我们无从知晓它的具体内容。

#### (二)《四书删正》和《书经删正》

《荆川疑难题意》付梓后,袁黄又作《四书便蒙》、《书经详节》,“大删朱注而略存其可通者,于嘉靖乙卯年刻行”。这里的“乙卯年”即嘉靖三十四年(1555)。这两部书当时都没有署名,出版后“遍传天下”,“家家传习”。五十年后,书坊又重版了这两部书,袁黄的友人将书名分别改为《四书删正》和《书经删正》,并署袁黄名字于上,结果招致“众口之叻叻”<sup>[12]</sup>卷3,《与邓长洲》p199下-200上

《四书删正》和《书经删正》是从科举考试的角度,在删简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和蔡沈的《书经集注》的基础上对四书和《书经》做的阐释,实际上是对朱熹等宋儒的反动。袁黄在《与邓长洲》中说四书五经“句句皆是家常实话”,批评朱熹等“宋儒训诂如举火焚空,一毫不着”,为此他“悯正学之蓁芜,开久迷之眼目”,决意要对《四书章句集注》和《书经集注》进行删节,进行重新阐释。时人李乐在《见闻杂记》中说《四书删正》“全不用朱夫子注,又见涂抹四书,凡圈外注全涂抹,其正注学、庸,十涂一二,论、孟十涂四五”<sup>[16]</sup>卷8。一些固守朱熹传注的士人开始攻击袁黄,斥责其“妄批削四书、书经集注”,刑部主事陈幼学还“驳正其书,抗疏论列”,结果这两部书皆遭查禁,“镂板尽毁”<sup>[17]</sup>卷281(《陈幼学传》)。当时的礼部郎中蔡献臣“取其书细加翻阅,见袁黄“将朱注尽行删削,甚至并其注而僭改之,中间异说破辞又多有与紫阳抵牾者”,因此他要求各地提学官将《四书删正》和《书经删正》等书“原版尽行烧毁,其刊刻鬻卖书贾一并治罪,仍严谕生童不得为其所祸,藏留传诵”<sup>[18]</sup>卷3,《烧毁四书书经删正等书札各提学》。但是,“禁之愈严而四方学者趋之愈众”<sup>[15]</sup>《刻了凡杂著》序p513下,袁黄的声望反而因此进一步大增。

现在《四书删正》和《书经删正》皆未见。

#### (三)《新刻八代文宗评注》

八卷,旧本题袁黄辑、程子侃评、刘宣化注,具体编纂年代不详,嘉靖书林叶氏作德堂刊,据此可知此书的编纂当在嘉靖年间。《四库全书总目》怀疑此书是袁黄所作,认为“是编取《文选》中之近于举业者,撮

<sup>①</sup> 袁黄的举业思想非常丰富,笔者将另撰文论述,这里只是结合科举考试的指导思想来作简单论述。

拾成书。有全删者，有节取数段者。舛谬百出，不能缕举。在坊刻中亦至陋之本。黄虽不以文章名，亦未必纰缪至是也”<sup>[19]</sup>卷193。笔者遍阅《袁了凡文集》，未能从中找到线索，但在袁黄给师友的书信中经常有“新刻四种，各具二册呈览”<sup>[13]</sup>卷9，《与朱养淳书》p1325之类的话，但很少提及具体的书名。该书是否为袁黄所作，还须进一步考证。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本。

#### (四)《谈文录》、《举业彀率》及《心鹄》

《游艺塾文规》扉页“题识”中说：“了凡先生旧有《谈文录》、《举业彀率》及《心鹄》等书，刊布海内，久为艺林所传诵。”由此可见，袁黄还编纂出版过《谈文录》、《举业彀率》和《心鹄》，除了《谈文录》外，其他两本在《游艺塾文规》和《游艺塾续文规》内文中也可以得到佐证。

《谈文录》具体内容已不可知，大概是关于八股文写作技法的图书，具体刊刻时间也不详，估计在《举业彀率》和《心鹄》前后。

《心鹄》刊刻于万历五年(1577)以前。《游艺塾文规》卷八《正讲五》开篇即说：“丁丑以前具载《心鹄》诸书者俱不论。论近科乡卷，汝辈今以乡卷为急，故备论之。”丁丑即万历五年，由此可见，该书编纂于万历五年之前。这段文字还传达了一个信息，那就是《心鹄》与《游艺塾文规》是同一类型的书，都是通过程文墨卷来解析举业文章的写作技法。万历庚寅年(1590)袁黄的门徒韩初命撰写的《〈祈嗣真詮〉引》中也谈及《心鹄》说：“先生登进士，名重天下，天下士传诵举子业，如《心鹄》、《备考》、《疏意》等书，令都市纸增价。”<sup>[15]</sup>《〈祈嗣真詮〉引》p546上

《举业彀率》编纂于万历五年。在《游艺塾续文规》中，袁黄说：“丁丑岁(1577)予著《举业彀率》，备论炼格之法，传之四方，颇于时艺有益，近日则又成文章一障矣！盖文字依题结构，千篇一律诚为可厌，然近来士子每遇题目辄推翻体制，纵横颠倒，有宜轻而反重，有宜后而反先，有宜详而反略，有宜串而反平，错乱不经，令人可厌！一遇考试，炼者多而不炼者少，则不炼者反新而炼者反俗矣！此势之所必然而弊之所当革也。”<sup>[12]</sup>卷四，《了凡先生论文·答袁坤仪》p212下 由此段引文可知《举业彀率》是讲述文章风格和结构的科举考试用书。

如果《谈文录》刊刻时间估计不错的话，以上6种科举考试用书都编纂和刊刻于其登第之前，除了《新刻八代文宗评注》外，估计都已散佚。

#### (五)《四书疏意》

杨士范在《刻了凡杂著》序中提到袁黄曾经著《四书疏意》二十四卷，根据韩初命在《〈祈嗣真詮〉引》中《疏意》等“令都市纸增价”之语，《四书疏意》应当在万历十八年前已经刊刻。但是清初朱彝尊的《经义

考》和乾隆年间的《浙江通志》卷242《经籍二》都只载《中庸疏意》二卷，未及《大学疏意》、《中庸疏意》和《孟子疏意》，可能皆遭禁毁。现在《四书疏意》皆未见。

#### (六)《群书备考》

清初徐乾学《传是楼书目》载：“《群书备考》八卷，(明)袁黄，隆庆，六本。”<sup>[20]</sup>《子部·丽字二格》如果徐乾学的记载无误的话，《群书备考》最早的刻本应当在隆庆年间。另外，前述《〈祈嗣真詮〉引》中提到的《备考》当指《群书备考》，据此可知隆庆以后至万历十八年前，袁黄可能又对《群书备考》进行了修订，其间至少又刊刻过一次，隆庆和万历十八年前的刻本今皆不存，《千顷堂书目》卷15、《明史》卷98《艺文三》所载《群书备考》二十卷可能是万历十八年前的刻本，但是有待进一步考证。

袁黄去世后，其子袁俨对《群书备考》做了进一步的整理和增益，于万历三十九年刊刻，该刻本分群书备考6卷，续二三场群书备考3卷，前6卷系袁俨整理原书而成，后3卷为袁俨增益的内容。崇祯五年，洪吉臣等人又将万历三十九年刻本“复参群书，互商并质”，“稍加增润而付之杀青”，这就是《增订二三场群书备考》。此外，该书还有崇祯十五年等刻本。

中国人民大学古籍所的张海惠先生认为《群书备考》的编纂“始于万历六年”，“书成之后，虽屡次删定，终未能付梓”，“万历三十九年，《群书备考》首次刊成”。<sup>[21]</sup>这可能是因为张先生仅仅依据现存的几个版本，故而得出了此结论。

《群书备考》主要是为科举考试而编纂，崇祯五年版本《举例》(相当于《凡例》)第一条说：“论、表、策非拾牙慧则效眉鬚，古学日湮，后生滋误，了凡先生综览秘籍，今事古事各因类著，经世石画俱是矣，勿作寻常括帖观。”由此可见该书主要是针对科举考试第二、三场的，崇祯五年版之所以将书名改为《增订二三场群书备考》，其意图也是为了进一步明确该书的定位，方便读者识别和购买。

#### (七)《游艺塾文规》、《游艺塾续文规》

书林叶仰山版《游艺塾文规》扉页“题识”中说：“了凡先……近杜门教子，复将新科墨卷自破而承而小，谓大讲，分类评定，如何而元，如何而魁，如何中式，一(目)了然……”，内文卷二又有“新科许解”<sup>[11]</sup>卷2，《破题》p24上破题的范文，其他地方也有几处“今年许解”之说，而许解是万历二十九年进士，据此可知该书编纂于万历二十九年。又“题识”末有“买者须认叶仰山原版”的告示性语言，该书末页有“万历壬寅孟冬月双峰堂余文台梓”的落款，据此可知该书的刊刻至迟在万历壬寅年(即万历三十年)冬。如果叶仰山的刻本是原版、余文台版是覆刻本的话，叶仰山版应

当在万历三十年冬之前,或者是在万历二十九年。但是由于明代版权意识薄弱,书商作伪的现象很普遍,不能排除叶仰山盗刻余文台版而冒充原版的可能。

《游艺塾文规》共十卷,除第一卷论述八股文的创作理论和自己的举业经历外,其余各卷对万历八年至二十九年的的墨卷从作文技法的角度做了详细的解析,“自破而承而小,谓大讲,分类评定,如何而元,如何而魁,如何中式,一(目)了然”。

在完成了《游艺塾文规》的编纂后,袁黄又开始了《游艺塾续文规》的编纂,该书共十八卷,前九卷为三十六家论文,其中三至五卷为《了凡袁先生论文》,这三十六家可以说几乎囊括了明代万历三十二年前几乎所有的八股文大家,有王守仁、王鏊、唐顺之、瞿景淳、薛应旗、茅坤、沈位、徐常吉、杜伟、郭子章、顾宪成、吴默、董其昌、王衡、孙月峰、冯梦祯、李廷机、袁宗道、陶望龄、汤宾尹、顾起元、王肯堂、黄汝亨、武之望、顾大韶等;后九卷是对万历三十年乡试和万历三十二年会试程文墨卷的评析。《游艺塾文规》国家图书馆和安徽图书馆各藏一部,日本内阁文库藏一部。国图本和安图本是同一版本,日本内阁文库笔者未及查阅。

#### (八)《古今经世文衡》

二十八卷,具体编纂年代不详,万历江苏吴县书林龚宪惠刊刻。国内仅有福建省图书馆存一部,另外日本遵经阁文库藏一部。笔者还没有来得及查阅,根据日本学者酒井中夫的介绍,该书“由天官部和地、春、夏、秋、冬官部的六部分组成”,“分类列举了与论课、论选、论试、考课、荐举、管制、舆地、户口、役法、食货、礼制、贡举、乐、兵、藩夷等有关的语文和事例”<sup>[22]</sup>。该书也应当主要是为科举考试而编纂,从内容看主要是针对二三场。

#### (九)《史汉定本》、《新镌了凡家传利用举业史记方润》

《史汉定本》又作《新刻凡袁先生纂辑史汉定本》,四册,十八卷,每册以分别以元、亨、利、贞名之。该书是袁黄对《史记》和《汉书》中《高祖本纪》和部分西汉人物传记的纂抄,旁有袁黄以小字作的评注。具体编纂年代不详,有建阳书林余象斗刻本,《袁了凡文集》收录的可能就是这一刻本。

《新镌了凡家传利用举业史记方润》五卷,具体编纂年代不详,万历王养虚二酉斋刊,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中载有此书,但未注藏于何处。笔者遍查各种图书馆藏书书目,也没有查到藏处。

#### (十)《袁了凡先生汇选古今文苑举业精华》

共四集。该书国内未见藏本,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有一部。笔者未及查阅。该书的扉页上有一段广告性的“题识”：“袁了凡先生,迹不课儿,已选《举业定

衡》(指《游艺塾文规》——引者注),海内珍之,兹复选举精华,以为后场之助,此最便科家捷径,故并梓之。”<sup>[22]</sup>由此可见,该书主要是针对第三场的。除上述科举考试用书外,袁黄还著有“《袁氏易传》十二卷、《毛诗袁注》三十卷、《尚书大旨》八卷、《春秋义例》三卷”<sup>[13]卷9,《答温一斋掌宪书》p1344</sup>,这些书虽然主要是研究性的,但在当时也是深受士子欢迎的科举考试用书。

## 四、明代科举考试的指导思想和二三场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

### (一)明代科举考试的指导思想

对于明代科举考试,学界一般笼统地说以程朱理学为指导思想,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非常错误的。如果我们动态地考察明代科举考试,就会发现,明前期的科举考试确实以程朱理学为指导,考生在答卷时大都能“专以程朱传注为主”<sup>[23]卷3</sup>。但明中后期情况就截然不同了,科举考试中开始大量出现“引用《庄》、《列》、《释》、《老》等书句语者”,士子们开始“以六经为滥套,而引用《左传》、《国语》矣。《史》、《汉》穷而用六子;六子穷而用百家,甚至取佛经、道藏,摘其句法口语而用之”<sup>[24]卷82,《科考二》</sup>。这种变化无疑是受阳明心学的影响,大致始于嘉靖年间,袁黄在嘉靖三十五年“大删朱注”的《四书便蒙》、《书经详节》“遍传天下”,“家家传习”就是有力的明证。隆庆二年,李春芳担任会试主考官,他所作的程文不但以王学解经,而且明显地以《庄子》之言入文,这在以前是绝对不可想象的,顾炎武认为“自此五十年间,举业所用,无非释、老之书”<sup>[25]卷18,《破题用庄子》</sup>。顾氏之言虽然有所夸张,但也反映了隆庆、万历年间科举考试指导思想的变化。时人徐显卿在一封信中也说:“窃惟文体士风与时高下,今士子所业者,久已离去本根,习为怪诞,其佞屈似深,其虚空似雅,其诡谲似奇,其剿袭似实,不知精神心术,悉逐于游淫汗漫而无所归着,他日形之施为,自然以凌逾为广,以矫亢为廉,以倾险变幻不可测识为高明,弊极矣。”<sup>[26]卷44,《礼部三·科场·前言》</sup>这里所说的“本根”实际上就是指程朱理学,这段话表明程朱理学已经丧失了其在科举考试中的统治地位。

袁黄曾师从阳明学的传人王艮,又曾得云谷禅师点拨,因此笃信禅宗学说,他的举业思想明显受阳明心学和禅宗思想的影响。他在自己编纂的举业用书中明确贬低朱注,主张“毋执一说”,大肆批评“宋儒训诂如举火焚空,一毫不着”,王锡爵之子王衡讽刺朱熹“理欲知行动辄分为两截,正如好座堂房零星夹断”<sup>[12]卷6,《岷山王先生论文》p244下</sup>,袁黄将其编入《游艺塾续文规》中。袁黄主张作文“要包罗天地古今之态,又要赤洒洒不染一尘……须先扫除鄙秽,涵泳性灵,有暇先

静坐三四月或半年，否则亦须随事遣情，于念中息念，将奔驰纷扰之妄心，艳慕繁华之妄见减得一分便有一分干净，久久自然尘芬渐退，澹泊虚融，然后取五经、周礼、老庄、列、荀、韩非、吕览、左、国、史、汉，次第读之”<sup>[11]卷1，《举业三昧》p4下</sup>。类似的话在袁黄编纂的举业用书以及其他著作中还很多，如在《游艺塾文规》中，袁黄又说：“今之做举业者，幼时染缘尚浅，天真尚存，其文可看，长而一涉俗事，未及四十气便衰而笔便窘矣。若是真修行人，虽七十八十，其知愈神，其文弥妙，惟其有本故也。”<sup>[11]卷1，《文有根本》p10下</sup>在卷四中袁黄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举子业……工夫全在平日涵养，胸中带一毫世情俗味则污此文趣矣，后生小子多玲珑可玩，以其染世浅而心常清也，至三四十岁文多滞塞者，尘累多而心杂也。”<sup>[11]卷4，《了凡先生论文》p207下</sup>从这些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袁黄的举业思想深深打上了心学和禅宗的烙印。袁黄还经常直接拿禅宗的语言来论述作文技巧，如他在《答钱明吾论文书》中说：“留心性命，屏除俗虑，诵中存习，作中存养，使腔子内精神常聚，生机常活，此举业本领工夫也！禅家谓，尽大地俱是晤门，故洒扫应对可以精义入神，岂有终日理会圣经贤传而反做障碍者乎？”<sup>[12]卷3，《了凡先生论文·答钱明吾论文书》p195下</sup>袁黄自己就是在接受了禅宗的静坐和修行思想，通过“顿悟”达到下笔成章的作文境界的：

仆庚午春读书于南京燕子矶……胸中无一毫杂累，终日作文沉思……颓然如醉，兀然如痴，蠢蠢然又如不晓事者，数月之后，一日偶从诸友登矶，远望江云，恍然如囚人脱夹，不胜鼓舞……自后题目到手便能成章，从前许多苦心极力处皆用不着矣！<sup>[12]卷3，《了凡先生论文·与于生论文书》p197下</sup>

不仅袁黄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当时很多举业大家都如此，袁黄的老师唐顺之就是其中的一个，还就曾劝戒袁黄多读禅书：

若《楞严》、《维摩》、《圆觉》诸经，皆所谓异书也。不但东坡苏公之文于《楞严》得悟，我于禅书不止此三经，涉阅颇广，自知得益甚深。吾弟于世情颇淡，今将一切闲书尽从屏省，只将此三经从容熟玩，句句要透悟本心，字字要消归自己。<sup>[12]卷1，《文有根本》p167下</sup>

袁黄将包含这段文字的书信收入了《游艺塾文规》。

以上引文不仅反映了禅宗对袁黄举业思想的影响，阳明心学的影响也可由此洞见，下面两段引文则更能体现心学对袁黄举业思想的影响：

文者枝叶也，其根本在心，心无秽念则文清，心无杂想则文纯，心不暴戾则文和，心不崎

岖则文平，心能空廓则文高，心能入微则文精……故欲工文先当治心……<sup>[11]卷1，《荆川唐先生论文·答袁坤仪》p10下</sup>

鄙人尝论作文之法大概有五：一曰存心，二曰养气，三曰穷理，四曰稽古，五曰透悟。夫文出于心，心丽则文丽，心细则文细；其心郁者其文塞，其心浅者其文浮，其心诡者其文虚，其心荡者其文不检……<sup>[12]卷3，《了凡先生论文·与于生论文书》p196下</sup>

阳明心学和禅宗对举业的影响绝不仅限于袁黄，袁黄所编纂的处处渗透着心学和禅宗思想的举业用书的畅销就说明了这一点。实际上明代中后期绝大多数的举业大家都受阳明心学和禅宗思想的影响，篇幅所限，不再详述。

## （二）二三场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

明代中后期，很多人批评当时科举考试只重首场，“而不深求其二三场”<sup>[25]卷16，《三场》</sup>，绝大多数学者据此认为明中后期的科举考试据第一场考试结果定去取，不看二三场；但是从当时出版的科举考试用书的种类看，时人的批评和后世学者的看法有失偏颇，笔者认为，明中后期实际的情形是首场确实最关键，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考官在阅卷时，既要看法第一场的八股文成绩，也要看法第二、三场的论、判、诏诰表和经史时务策的成绩。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明中后期专门针对二、三场的科举考试用书至少有上百种，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书坊所刻，这说明当时这类图书的需求量也很大。如果考官判卷只阅首场，二三场考试只是敷衍塞责的话，唯利是图的书坊绝对不会刊刻那么多专门针对二三场的考试用书。很多历史事实也说明了这一点，如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李玘在嘉靖三十八年的担任会试主考官时就是三场并重，他在《会试录序》中写道：“故事匭卷入必先同试，同试可，而后主试者得受册览观焉，臣虑或遗良也，语同试考更搜之弃卷中，分阅合校加详焉，必三试称众见金同者收之。”<sup>[27]卷6</sup>明中后期还有因二、三场成绩优异而被录取者，据明末清初的诗人施闰章记载，嘉靖四十四年中进士的归有光就是因第三场成绩优秀而被录取的，他说：“昔归震川先生老于棘闱，亦缘后场入彀。”<sup>[28]卷2</sup>而袁宏道乡试时也是以后场优异中第，他“戊子（1588年——引者注），举于乡，主试者为山东冯卓庵太史，见其后场，出入周、秦间，急拔之”<sup>[29]附录2，p703《吏部验封司郎中郎先生行状》</sup>。

关于二三场在整个科举考试中的地位，从袁黄所编纂的科举考试用书中也可窥见一斑。

首先，在《游艺塾文规》中，第五卷大部分内容是讲论、表、判、策等二三场的作文技法；另外，《古今

经世文衡》、《史汉定本》、《旁注史汉芳润》、《新镌了凡家传利用举业史记方润》、《袁了凡先生汇选古今文苑举业精华》则主要是针对二三场的科举考试用书,如果二三场可有可无,精明的书坊主是不会投资刊刻这类图书的。其次,袁黄本人的科举经历也说明当时的科举考试并非只重首场。隆庆五年袁黄首次参加会试,虽然因头场经义作得好而“本房取首卷”,但却因“五策不合式下第”。

再次,归有光“缘后场入彀”之事在《游艺塾续文规》卷三中有更加详细的记载。归有光“博恰有盛名”,但因其“经书义涉古奥”,一般人都很难理解,因此先后参加了八次会试都未及第,嘉靖四十四年,59岁的归有光第九次参加会试,高拱为主考,余有丁为分考官,恰巧归有光在其分房,余有丁看了归有光头场的八股文后,知道是他的卷子,对几位同考官说:“此可中否?”结果几位同考官都感到为难,余有丁又说:“此去有司之绳墨甚远,然非凡品,姑置之俟检后场以定去留!”等看了后场后,余有丁对同考官说:“真巨儒笔也!”但是,余有丁不敢送初场文字给高拱,“但以二三场送阅,遂得中选”<sup>[12]卷3,4与邓长洲p204上</sup>。袁黄的记述印证了清初诗人施闰章的记载。归有光首场达不到录取标准,“去有司之绳墨甚远”,但却凭借二三场中第,而且主考官竟然没有看其首场文字,这也说明了二三场也很重要,在个别情况下甚至成为是否被录取的关键性因素。

综上所述,通过对袁黄编纂的科举考试用书的考订和分析,结合其他历史资料,我们可以澄清很多对于明代科举考试的错误认识:明中后期虽然仍有一些士大夫固守程朱理学,但其在意识形态上的绝对统治地位却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在科举考试中,指导思想开始多元化,阳明心学的地位超过了程朱理学;科举考试中首场虽然最重要,但二三场也很关键,长期以来学界比较普遍认同的明代科举考试“只重首

场”和“八股取士”的提法是错误的,至少是欠妥当的。

#### 参考文献:

- [1] (明)郎瑛. 七修类稿[M]. 明刻本.
- [2] (清)觉罗石麟修,储大文纂.(雍正)山西通志[M]. 清嘉庆十六年刻本.
- [3] 黄训编. 名臣经济录[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4] (明)黄佐. 南雍志[M]. 民国影印嘉靖三十二年刻增修本.
- [5] 明孝宗实录[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 [6] 明武宗实录[M].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 [7] (明)廖道南. 殿阁词林记[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8] 黄宗羲. 明文海[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 [9] (明)王祖嫡. 师竹堂集[M]. 明天启刻本.
- [10] 章宏伟. 袁了凡生平事迹考述(上)[G]//田澍,等. 第十一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
- [11] 袁黄. 游艺塾文规[M]. 续修四库全书本.
- [12] 袁黄. 游艺塾续文规[M]. 续修四库全书本.
- [13] 袁黄. 两行斋集[M]//《袁了凡文集》本. 线装书局,2007.
- [14] 吴江县志[M]. 民国石印本.
- [15] 袁黄. 了凡杂著[M]. 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80册.
- [16] 李乐. 见闻杂记[M]. 明万历刻清补修本.
- [17]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97.
- [18] (明)蔡献臣. 清白堂稿[M]. 明崇祯刻本.
- [19]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 乾隆武英殿刻本.
- [20] 徐乾学. 传是楼书目[M]. 道光八年刻本.
- [21] 张海惠. 《群书备考》版本考[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0(4):29-31.
- [22] 酒井忠夫. 袁了凡的生平及著作[J]. 尹建华,译. 宗教学研究,1998(2):78-82.
- [23] 何良俊. 四友斋丛说[M]. 万历七年张仲颐刻本.
- [24] 王世贞. 弇山堂别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5] 顾炎武. 日知录[M]. 清乾隆刻本.
- [26] (明)张萱. 西园闻见录[M]. 民国哈佛燕京学社印本.
- [27] (明)李玘. 西野李先生遗稿[M]. 四库存目丛书本.
- [28] 施闰章. 学余堂外集[M].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29] 袁宏道. 袁宏道集笺校[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责任编辑 张颖超

## Yuan Huang and Compila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Books

—On the Second and Third Examinations

ZHANG Xian-zhong

(School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17,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commercial publishing are well developed. A large number of examinations bookstores published books to meet the demand, and many well-known scholars became the authors of examination books. Yuan Huang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ones. He compiled a lot of examination books, which were very popular and had a great influence upon the scholar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examination books compiled by Yuan Huang and the status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examinations.

**Key words:** Yuan Huang; examination books; guidelines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the second and third examinations